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 科研简报

2011 年第 3 期（总第 31 期）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编

2011 年 09 月 20 日

---

## 本期要目

### 特别报道

唐亚林教授入选 2011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

林尚立教授入选 2011 年度第一批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我院有 6 项科研项目入选 2011 年上海市社科规划课题资助

### 成果简介·专著

### 成果简介·论文

国际政治系 (P5)

政治学系 (P7)

公共行政系 (P9)

## ➤ 特别报道

### 唐亚林教授入选 2011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

教育部重大委托课题具有针对性、紧迫性与前瞻性的特点，按照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管理要求进行管理，以取得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的研究成果为研究目标，研究意义重大。

近日，经专家研究，正式批准《政府绩效管理：理论构建与中国实践》课题为 2011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项目负责人：丁顺生 唐亚林，项目批准经费为 20 万。

### 林尚立教授入选 2011 年度第一批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日前，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2011 年度第一批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评审结果现已公示，我院林尚立教授入选其中，详情如下：

项目名称	负责人
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以统一战线为视角	林尚立

### 我院有 6 项科研项目入选 2011 年上海市社科规划课题资助

近日，经专家评审，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我院有 4 项一般课题和 2 项系列研究课题获准立项，详情如下：

一般课题	负责人
互联网与国际关系——以“谷歌事件”、“推特革命”和“维基揭秘”为例	沈逸
区县合并中绩效时滞治理研究——协调机制视角	李瑞昌
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场域的权力结构及政治效应研究	扶松茂
上海市政府公信度调查研究	李春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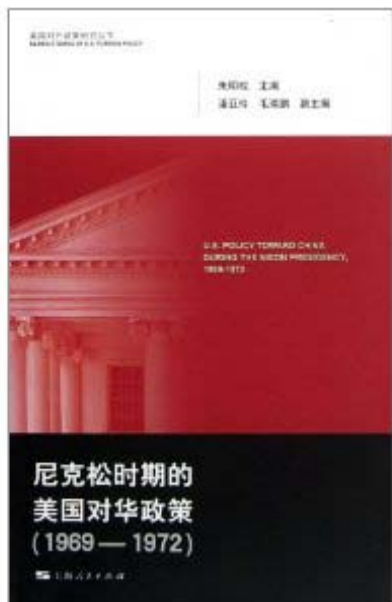
系列研究课题	负责人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规律研究	林尚立
上海基层党建创新理论与实践研究	郑长忠

## ➤ 成果简介·专著

### 尼克松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1969-1972）

朱明权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6月版



《尼克松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1969-1972）》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美国对外政策研究丛书”的第二册，主要利用美国解密的档案重新探讨在尼克松第一总统任期中美国的对华政策以及这些政策的制定过程。全书讨论了尼克松政府就美国对中国大陆的政策所作的调整和取得的进展，包括基辛格的“破冰之旅”、尼克松的“和平之旅”；探讨了尼克松政府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政策；分析了尼克松政府在接触中国的过程中对秘密联络渠道的运用。该书认为，与约翰逊政府出于权宜之计和策略需要调整对华政策

不同，尼克松政府更多是从战略需要调整对华政策，采用了“限制加接触”的两手做法。《尼克松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1969-1972）》也提出，美国对中国大陆的政策是其整个对华政策中的主体部分，支配了美国对台湾当局的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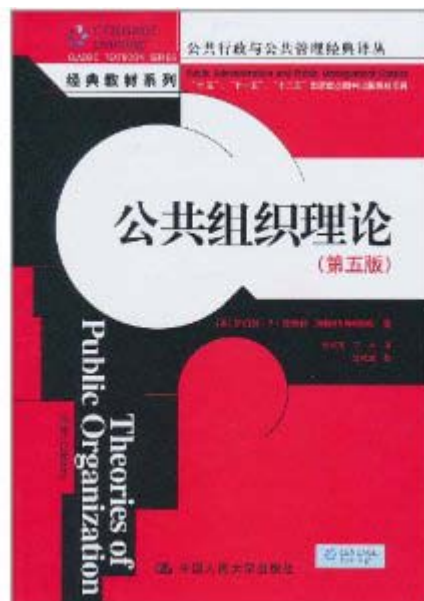
### 公共组织理论（第五版）

扶松茂等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年4月版

《公共组织理论(第5版)》是组织理论领域的经典著作，它对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的组织理论进行了梳理，对很多该领域知名作者的经典著作进行了评述。作者在这种梳理的基础之上，着眼于当前美国学界对于公共行政的争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新公共服务，以将新公共服务与已有理论进行对比的方式对这一观点进行全面的阐述。《公共组织理论(第5版)》是一本关于理论的书，也是一本关于实践的书。作为一个具有理论家和实践工作者双重身份的学者，登哈特很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公共组织理论(第5版)》穿插着对理论进行解释的小例子，使晦涩深奥的理论鲜明易懂。

### 国际关系评论：欧洲视角



潘忠岐、简军波、张晓通 译，陈志敏 校对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8月版

《国际关系理论:欧洲视角》是一位欧洲学者从欧洲视角对国际关系理论所作的批判性分析，内容涉及国际关系理论在欧洲的起源，国际关系体系研究方法在美国的兴起，现实主义、激进主义、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各种理论流派之间的纷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国内因素的影响和外交决策，主权观念的历史演进，以及欧洲研究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贡献等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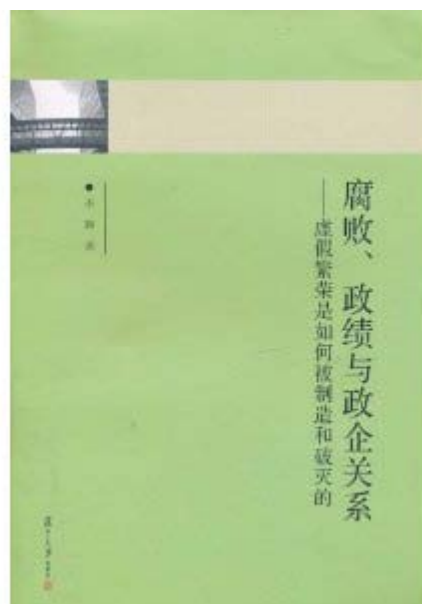
作者强调，“欧洲视角”决不是“欧洲中心主义”。尽管“欧洲是国际关系新理念的实验室”，“为国际关系理论带来了一场真正革命和一个主要挑战”，但没有理由因此把欧洲看作是后现代的、后威斯特伐利亚的和后国家中心主义的，并与非欧洲世界对立起来。主权的汇集和共享并不构成主权的终结，不意味着一个后政府或后民族国家实体在欧洲出现，也不意味着帝国的或世界性的欧洲超级大国正在形成，更不意味着要以琐碎的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方式将这些趋势推广到全球范围。

## 腐败、政绩与政企关系--虚假繁荣是如何被制造和破灭的

李辉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年6月版

《腐败、政绩与政企关系:虚假繁荣是如何被制造和破灭的》是对某内陆城市一个国企集团破产腐败案的案例研究。作者通过追踪地方政府在该集团从组建、壮大到衰亡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同影响，提出“政绩驱动”是促使地方政府和官员积极涉入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因，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滋生了大量贪污腐败的机会。在案例中可以发现，处于同样的政绩激励结构下，沿海与内地地方官员的回应策略却差异甚大；在任期内无法通过真正实现经济增长来赢得政绩的地方，官员会采取替代性策略来执行中央政策，其中包括案例中凸显的“自我表现的策略”，即通过上下迎合、制造繁荣的方式来获取政绩。对此，作者认为，若考虑到地方政府“合谋”的可能，中央政府必须调整现有的监督体制，才能保证晋升激励机制的正面效用。



## 国际政治系

### 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方略

陈玉刚

学习月刊 2011年第1期

和平建设时期，话语权是最重要的武器。谁最有资格说话，谁说的话最有影响力和号召力，谁就掌握了最大的权力。

话语权有两个层面上的含义：一是因其在机制、组织中的地位和分量而赋予话语主体的意见权和决定权。这是一种组织性话语权，直接表现为对组织决策的影响力。组织性话语权由组织规章和程序来规定和保证。二是基于话语主体的社会地位、综合实力、权威声望等而获得的话语影响力，是非组织话语权。

国际社会的实际存在着五种基本话语权：一是组织性话语权。二是道义话语权。三是专业话语权。四是垄断话语权。五是霸权话语权。

今后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一是不断扩大国际话语权的道义基础和资源。二是争取更多的组织性话语权。三是高度重视专业话语权。四是坚决抵制霸权话语权。五是加强话语传播和观念供给的能力。话语权需要载体和媒介。进一步提高中文的国际性，建设更多的国际传播渠道和更强的国际传播能力，加强能反映时代要求和发展潮流的观念创造能力，应该成为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中一项尤为重要工作。

### 跨国公司的公共外交政策

黄河

公共外交季刊 2011年夏季号总第6期

跨国公司日益正在日益成为一种“政府对人民”沟通中的“第三者”，承担了传统外交多无法达到或适应的角色功能。

跨国公司影响国家关系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他们各自在国际生产领域的结构性权力以及国际经济交往的各种舞台，面对外国的非政府组织、广大公众甚至政府机构，从不同角度表达本国的国情和国际政策，是其公共外交可以更直接、更广泛地面对外国公众和主流社会人士，能更有效地增强本国的文化吸引力和政治影响力，改善国际舆论环境，维护国家利益。

2011年中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问题出现后，波音公司游说国会，促进中美关系经贸关系正常化。一是通过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领导商业组织对国会议员和政府高层人士进行游说，而是通过公司的民间组织对美国民众进行宣传，改变一些美国人对中国的偏见，以达到利用选民的力量改变议员立场的目的。类似的案例还有丰田公司挽救日美汽车贸易谈判破裂败局。

跨国公司具有重大的公共外交能力和影响还体现在其他两个方面，即：政府与跨国且“联姻”，经济关系政治化；减少文化观念冲突，规避政治投资风险。中国应积极开展公共外交，通过善意的行为和话语赢取别国民心，并通过塑造本国良好形象和改变他国政府及人民看法的方式来推动本国跨国企业经济目标的实现。

## “欧盟危机”凸显权利和利益双博弈

陈玉刚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1年5月26日

希望借《里斯本条约》脱胎换骨的欧盟，却在条约生效一年多来遭遇了政治、经济、社会和安全的多重危机。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机加剧并在欧洲迅速转变成欧元危机，有国家面临退出欧元的危险，欧盟统一货币成果面临来自市场力量的严峻挑战；另一方面，西亚北非地区的动荡在欧洲门口造成安全危机和大量难民涌入的难题，导致有些欧洲国家重新树立边境隔墙。部分疑虑派再次发出了“欧洲一体化麻烦了”的警告。

但是，危机并不意味着欧盟的结束。问题和危机本身才是观察欧洲一体化怎样发展的源头。说到底，欧洲一体化是被动应对式的，而非主动造型的。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统一是欧盟经济一体化的问题根源。目前，欧洲债务危机的实质不在于有没有救的能力，而施救方和受救方、欧盟和成员国之间的权力博弈。

《申根协定》允许成员国采取临时措施，检查人员往来只是边境控制的内容之一。所谓限制自由流动的措施，其目的并不是逆转《申根协定》，而是对其他方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改变做法。《申根协定》虽然消除了内部边境，但成员国在诸如移民和难民政策上并不统一。而申根区域的内陆国和边境国之间，在边境控制成本分担上也存在着问题。

欧盟一体化发展至今，已不是简单的前进和倒退的问题，而是权力和利益的博弈问题。问题和危机是这种权力和利益博弈的最佳时机。

## 探索新媒体管理刻不容缓

沈逸

人民日报 2011年8月22日

理解新媒体以及探讨如何有效管理新媒体，必须看到其背后所隐含的传播秩序之争。在现阶段，以美国为代表的占据绝对优势的国家，试图通过塑造全球网络空间新行为准则，继续巩固以信息“自由流动”与自我中心为基本特征的传播秩序，谋求在政治领域获得推动民主化与政权更迭的新工具，在经济领域收获更多的商业利润，在文化领域拓展自身的影响力。

新媒体的出现以及由此产生的挑战，其本质在于推动政治权力的重构，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权力要素来源的重构。信息、传播信息的技术与基础设施、掌握和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构成全新的权力来源。第二是权力形态的重构。隐形的灵巧权力呈现上升趋势。第三是权力分布的重构。约瑟夫·奈认为，可以用权力流散和权力再分配来描述这种动向。前者指权力从国家行为体流向非国家行为体，后者指权力在不同国家之间中心流动。

在管理社交网络方面，对自身国家安全状况比较自信的国家，偏好采取以开放乃至近似自由放任为特征的政策，并与掌握信息技术优势的跨国政府、具有组织动员能力的跨国组织协调，从政治、技术和社会三个层面，向相对处在弱势地位的行为体施加压力，推动其采取符合特定国家标准的行动。对于其他国家，则面临着如何通过强化技术力量，完善制度建设等方式，在获取并享受社交网络等新技术发展带来的积极成果的同时，保卫自身的核心利益，维持正常的政治秩序，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强化主权壁垒，推动技术开发，完善法律规范，仍然是主权国家的首要选择。

# 政治学系

## 建构民主的政治逻辑--从马克思的民主理论出发

林尚立

学术界 2011年5月

认识社会动物，人在社会中的自由离不开秩序。为了社会秩序，人们建立国家。国家的使命是保证人的自由。这决定了民主制是一切国家制度的本质属性。

马克思把民主制看作是“类概念的国家制度”，认为民主制不是构建出来的，是国家制度本身的自我规定。但是，在国家行使范围内的国家制度，即作为某种具体形式而存在的国家制度，则是人们建构起来的。民主建构的政治逻辑表明，民主制是人们普遍的追求，但应该以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形式呈现出来，则取决于具体国家与社会的现实条件和发展可能，没有定规，更没有统一的模式。

## 中国没有解体的政治逻辑

刘建军

社会科学报 2011年6月30日

中国之所以能够避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命运，与其说是根源于两者社会背景、文化政治传统以及制度设计上的不同，不如说根源于执政党及其领导层自身的能力和战略的差异。

中国保持政治连续性、稳定性的奥秘在于中国共产党对苏共之弊端的超越与克服。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第一，中国共产党不颠覆既有的政治传统，而是不断巩固这一传统，正确对待前人的错误与贡献。第二，在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老一代革命家，为中国化解危机和克服分裂缔造了坚固的防线。第三，中国共产党在探索权利更替和领导更迭方面，走出了既不同于多党制国家也不同于苏联一党制国家的独特之路，将魅力型领导者、变革型领导者与制度化领导者统一起来，这是决定苏联和中国之迥然不同命运的根本所在。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在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阶层革命化、专业化、年轻化、知识化的道路上，做出了具有远见卓识的布局。

## 中国人大制度研究的理论演进

何俊志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1年7月10日第4期

中国人大制度在近一个世纪的研究传统中，形成了一些基本的理论模式。一是苏维埃模式，即认为就基本原理而言，人民代表大会在性质上仍是苏维埃政权的组成部分，按照苏维埃的原则在开展工作；二是民主化模式，主要致力于从民主化角度来考察中国人大制度的变化所体现出的民主意蕴；第三种是治理模式；该模式认为中国人大制度的发展是执政党出于治理的目的而主动释放空间的结果。

就中国人大制度的发展而言，有两个方面极其值得注意。首先，1954年宪法所确立的人大制度在模仿苏维埃制度的同时就已经进行了一定的取舍，使执政精英得以在不同时期按照政党的政治目标来调整和改革这一制度。其次，就其性质而言是一套民意代表机关的人民

代表大会，是作为一套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因而是体现“国家意志”而吸纳“民意代表”参与的制度体系。但无论是治理模式还是民主化模式，都采用机构主体的分析方法，忽视了选民、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等也是参与人大行动的重要主体。

只包括政党、人大和政府的分析框架，已经难以充分揭示中国人大制度在新阶段上的变迁。必须将新的行动者纳入分析框架，在更大的范围内分析政党、人大常委会、政府和新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带来的法律修改和引发的制度变迁。

## 公共行政系

### 政府部门内监管体制改革方向选择：机制与组织分层重构

李瑞昌

理论与改革 2011 年 4 月

“谁能监督政府”一直是理论和实践探索的难题。政府能自己监督自己吗？政府部门内监管制度从监督对象上划分，既包括政权对社会监管也包括对政权体系自身监督，即商业监管和监管政府。政府部门内部监管体制有助于解决监管政府种中的专业化监管、事前、事中监管空缺的难题。但是，由于“自我监督”的内在缺陷，造成政府部门内部监管制度存在三大问题，即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关系问题、内部监管的目的与价值冲突问题和监管机构分工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理论和实务界从组织设置角度提出了“职务高配”、“设置垂直管理模式”或“横向一体化”三种改革方案。

结合警务督察个案分析，解决前述问题关键在于要重设协调机制和重构组织结构。首先，要在行政体系之内和内、外部监管组织之中建立四重协调机制：人与人间协商、制度间协和、任务间协同和行动间协作。其次，要从三个层面考虑组织体制变革：第一是县级尤其是乡镇派出所可以考虑实行内部监管组织合并、实行横向一体化，主要解决身份认同问题。第二是市级政府层面可以考虑实行垂直管理模式，主要解决制度适配问题。第三是省级和中央政府层面应保持不同类型监管部门按照专业化设置模式，但应建立决策委员会或者领导小组。除此之外，还要重点考虑非正式监管系统与正式监管系统之间配合以助于监管功能更好发挥。